

# 祝賀「港日佛教文化交流協會」成立

高永霄

港日佛教文化交流協會終於在香港洗塵法師和日本梶浦逸外禪師的努力促進下，於一九八〇年十月二日在香港新界藍地妙法寺舉行成立典禮，參加者有香港佛教團體代表成員數十人，及日本佛教使節團四十二人，極一時之盛，過程異常莊嚴隆重，是香港佛教本年的一件大事。

我們回顧日本的佛教是從中國傳到百濟後，再傳到日本的。

依據「日本書紀」所載，乃是在欽明天皇十三年（五五二），即是我國南北朝梁武帝時代，百濟聖明王遣西部姬氏達率怒唴斯致契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列表讚禮拜功德云：是法由於諸法中最殊勝，難能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無上菩提。譬如人懷隨意寶，遂所須用盡依情，此妙法寶亦復然，祈願依情無所乏。且夫遠自天竺，爰泊三韓，依教奉行，無不尊敬。由是百濟王聖明東流。是日，天皇聞已，歡喜踊躍，詔使者云，朕從昔來，未曾得聞如是微妙之法。

（見日本書紀欽明天皇十三年冬十月條）

於是，天皇遂命大臣稻目安置佛像於向原寺，勅令禮拜，是爲日本佛教流傳開始。其後，我國佛教文化，亦以百濟爲媒介，相繼傳入日本，因而對日本文化發生了啓蒙作用。

此後，日本佛教又得到聖德太子的大力弘揚，因而興盛起來，宏偉華麗之法隆寺亦於當時建成，其他佛教寺院建築和雕刻藝術，都是仿照中國形式，可見中國藝術影響甚大。

隋煬帝大業四年（六〇八），日本遣使小野妹子朝拜，並僧旻等沙門數十人求學佛法，此爲中日正式開始交通，僧旻在中國留學二十四年，才回到日本，孝德天皇付以重任，故於文化革新

的貢獻甚多。

日本受我國文化影響，是以唐朝制度爲最大，當時日本曾派出十九次遣使赴唐，並有留學僧及留學生達數百人，適值當時是我國佛教的黃金時代，所以佛學各宗派亦隨於學僧回國時傳入日本，大盛起來，所謂南都（奈良）六宗——三論、成實、法相、俱舍、華嚴、律宗亦相繼成立。其人材鼎盛，勢力强大，佛教發展，殊屬驚人，查奈良都乃模倣中國的長安爲藍圖而建成，到現在仍保存有佛教寺院數百間，成爲佛教的勝地。其中招提寺、興福寺、東大寺、藥師寺、西大寺等最爲著名。

招提寺是我國鑑真大師渡日時所建，鑑真大師爲確立日本佛教的傳戒規範，不惜經過六次艱苦航海，終於天平勝寶四年（七五二）抵達日本，傳授戒律，爲我國僧人樹立楷模，得到日本人

的尊崇，歷久不替。

平安朝時代，日本遷都平安京（京都），當時有兩位名僧——最澄和空海先後被遣送入唐，他們回國後，最澄開創日本天台宗，空海始立真言宗，成爲日後日本佛教之盛大宗派。

最澄（傳教大師）於延曆二十三年（八〇四）到達中國，依天台山國清寺道遼學天台教，翌年回國，於比叡山立院教學。空海（弘法大師）則留唐二年，依惠果阿闍梨學密。大同元年（八〇六）返日，後在高野山建金剛峯寺，兩大僧同時發展所謂「山林佛教」，仿效中國叢林寺院制度。

當日本鎌倉時代淨土教勃興，正是我國宋朝時期的禪宗盛行，日僧入宋者多習禪法，其中以榮西和道元爲最著名，榮西兩度入宋，首次在仁安三年（一一六八），停留一年而回，第二次於文治三年（一一八七），就天台山懷敞學禪，在宋留學五年，回國後於京都立建仁寺，鎌倉建壽福寺，提倡禪宗，爲日本臨濟禪宗之開祖。

我國禪師蘭溪道隆，亦於貞應二年（一二二三）入宋，就天童山長翁如淨學禪，傳曹洞宗正脈，五年後返回日本，初於山城建興聖寺，後建永平寺，是日本曹洞宗的始祖。

繼道隆主持建長寺者爲我國禪僧無學祖元，乃北條時宗備具書幣，聘師東渡，於日本弘安二年秋（一二七九）入建長寺，興建建長禪寺，依中國叢林清規，大振禪風，其弟子無隱圓範等日僧多人，亦相繼入宋學禪。

我國禪師蘭溪道隆，亦於南宋理宗淳祐六年（一二四六），偕弟子紹仁（普覺），龍江等東渡，執權北條時賴迎至鎌倉，興建建長禪寺，依中國叢林清規，大振禪風，其弟子無隱圓範等日僧多人，亦相繼入宋學禪。

繼道隆主持建長寺者爲我國禪僧無學祖元，乃北條時宗備具書幣，聘師東渡，於日本弘安二年秋（一二七九）入建長寺，開堂說法，弘安九年建圓覺寺，請祖元爲開山，甚爲時宗器重。

由於南宋朝時期，中日兩國禪僧往來頻繁，宋版大藏經及其他典籍，繪畫，佛像文物等亦輸入日本，對日本文化藝術的影響至爲巨大，自不待言。

元朝東渡，我國僧人，多爲弘傳禪宗，計有一山一寧、石梁仁恭、雪山道隱，清拙正澄、明極楚俊等十餘人，他們多居留於建長、圓覺、南禪、建仁等寺院，鼓吹禪風，甚爲奏效，而入元僧人數更爲可觀，有文獻可徵者，達二百二十人以上，多以禪僧稱呼，其盛況可見一斑。

中國明朝時代，佛教經已衰微，唯日本佛教正方興未艾，所以入明僧侶仍然甚多，渠等乃考察明代社會情況爲實，旁及佛法的研究，故多負有政府使命而擔當遺明正副使者，其中不乏文學修養之士，留下不少詩文集，供國人欣賞。但我國東渡的明僧顯著減少，他們雖亦屬道學兼優之高僧，與日僧交往，亦祇作文學藝術上之酬酢，詩文唱和，繪畫書道等，對日本各種學術方面，亦有刺激作用，由此促進日本思想和生活方面的發達。

在明末清初時候，日本德川幕府時代，長崎的中國僧人都希望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國高僧到來日本領導禪林，於是是由興福寺住持逸然遣僧古石聘請隱元隆琦，東渡弘法，以振禪風。於是隱元遂於明永曆八年（一六五四）東渡，後抵長崎時年已六十三。

隱元初開法於興福寺，越年遷崇福寺，萬治二年（一六五八）德川家綱賜地於山城宇治，建立寺院，仍以黃檗山萬福寺爲名，是爲日本黃檗宗之始祖，此後該寺住持皆中國僧人，直至第十四世才由日僧繼承。隱元所開之黃檗宗，朝氣蓬勃，把當時萎靡不振之臨濟宗和曹洞宗，刺激起來，受到重大的鼓舞，大振禪風。

日本自明治維新成功後，接受歐美物質文明，對於中國文化逐漸疏遠，反而我國人羨慕日本強國之道，忠欲效法，趨於富強。因此我國各省設立學堂，赴日讀師範教育者，數目至巨，而我國亦開始由日本傳入西方文化。

當時日本佛教亦力求改革，採納西方治學方法，趨向於學術化。首先派遣南條文雄到英國留學，在牛津大學專攻梵文，他與米勒教授校訂大乘經典原文，在「牛津逸書」出版。

其次，高楠順次郎亦繼南條後赴英，研究梵文，印度文學，比較宗教學等。其後又到德國研讀巴利語、吠陀、奧義書等，回

國後擔任東京大學語言學教授，為日本佛學界權威。

在高楠門下，有木村泰賢，宇井伯壽等佛教學者，從事於梵文原典的譯述。其後日本佛教學者更將漢文經典整理出版，輯成「日本大藏經」，「大日本正藏經」及「續藏經」；並於一九三四年完成「大正新修大藏經」一百巨冊，提高漢文佛典在世界佛教文學的地位。

在昭和年間，日本佛教界學者輩出，著名的有鈴木大拙，佐佐木月蘂等教授，其後又有金倉圓照、常盤大定，山口益、宮本正尊等，都是蜚聲於國際學術界之學者。

其時在中國，有楊仁山居士棲心佛學，初讀楞嚴經及大乘起信論，頗有領悟，於是發心刻印經典，創金陵刻經處校勘出版，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奉派隨劉芝田出使英國，結識南條文雄。並得南條之助，從日本搜得我國隋唐古德逸本經典數百種，

刻印流通，並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開辦祇洹精舍佛教學堂，參加者有太虛、智光、歐陽竟無、梅光羲等二十人，都是復興近代中國佛教的人物，在中國佛教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

祇洹精舍未及兩年因經費不足而停辦，楊仁山隨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創立佛學研究會，開居士講佛學之先河，翌年楊仁山逝世，遺囑金陵刻經處，由歐陽竟無主其事，歐陽竟無為搜求佛典遺籍，曾東渡日本，回國後，校印法相唯識經論千餘卷，並於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一）得梁任公、蔡子民、葉玉甫之助，組織支那內學院，研究法相唯識，以參攷日本學者之治學方法，注重佛典梵文，巴利文，西藏文的研究，由呂澂、王恩洋、邱虛明，董耦庚、黃懺華、湯用彤等學者為導師，又與日本著名學著作

文字上之學術性交流，旋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開辦法相大學，注重經論及佛史的研究，可惜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而暫停辦。

與支那內學院同時蜚聲於當時的中國佛教界者乃太虛大師創辦之武昌佛學院，武院成立於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舉梁任公為董事長，李隱塵為院護，課程參攷日本佛教大學，管理採取禪林規則，招收僧俗學生七十名，僧衆有法尊、法舫、芝峯、默庵、會覺等。並於院外設立研究部，聘張化聲為教授，故學術氣味甚為濃厚。

武院於民十三年（一九二四）舉行畢業典禮，畢業生有六十名，續招新生，以比丘為限，更聘唐大圓為教授，佛學研究中心偏乎各佛教宗派，故不同內院獨尙唯識宗。

太虛弟子大勇，於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東渡學密，越二年，領得高野山金山穆韶阿闍梨兩界大法，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歸國，傳修密法，入壇者有二百餘人。並得湯鑄新之助，於北京慈恩寺成立「藏文學院」，武院之大剛、法尊、觀空、法舫前往就學，專習藏文。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大勇改藏文學院為留藏學法團，率法尊、恆演、大剛、嚴定、密悟等取道川康入藏，唯阻於康定，刻苦修學，後大勇不幸於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卒於甘孜。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太虛大師住持廈門南普陀寺，兼任閩南佛學院院長，命芝峯、大醒任教務之職，有學僧七八十名，劃閩院為世界佛學院之華日文系，聘日人神田慧雲為日文教授，其他學科均仿大學班制，民國十九年第一屆畢業，續設研究部，為研究佛學之中心。

太虛大師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歐遊時，在巴黎發起籌設世界佛學院，以溝通東西文化。回國後於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在四川北酷縉雲寺創立漢藏教理院，從事研究西藏佛學，並命留藏學僧法尊主持院務，法尊於漢院譯出「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畧論」，「現觀莊嚴論」，「入中論」等重要西藏典藉。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秋，太虛大師曾在廬山大林寺倡議召開之第一次「世界佛教聯合會」，參加者除我國代表十餘人外，尚有日本法隆寺大僧正佐伯定胤及帝國大學梵文學博士木村太賢代表日本佛教聯合會，其他代表有德國、英國、法國、芬蘭之佛教學者七人，會期為七天完滿，除演講會議外，決定翌年在日本開會。

東亞佛教大會在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十月於日本東京召

開。我國出席者有三十人，太虛大師和道階法師爲團長，團員有持松、曼殊、王一亭、韓清淨、楊鶴慶等，會場在增上寺舉行，開會議程共七天，日本各宗派領袖三四十人，朝鮮七八人，台灣四五人，暹羅一人參加推定法相宗管長佐伯定胤爲正會長，道階法師爲副會長。會畢，由水野梅曉等陪同參訪日本全國各處寺院名勝，佛教大學，歷時二十餘日，然後回國，在日期內，我國代表團會晤南條文雄，井上圓了，村上專精，大內青巒，高楠順次郎，鈴木大拙，渡邊海旭，常盤大定，木村泰賢，金山穆韶等教授學者，對兩國間之佛教學術交流增益不淺，其謀求中日親善，促進和平的意願，表露無遺。故太虛大師爲中國代表團作「告別日本佛教同袍文」內有：

「喜馬拉兮高何極，太平洋兮深莫測，森羅萬有兮昭一心，華夏扶桑兮融大日。賦同袍兮天地寬，轉法輪兮歐美入，話分情兮聊贈言，申謝忱兮欲奚說。」

以上所述乃就中日兩國的佛教歷史淵源，其關係的異常密切，和在文化學術，社會習俗互相影響之下，至爲巨大，此皆是兩國先賢碩德在二千四百多年來所締造之偉大成果。雖然，至從日本軍國主義在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發動「九一八」事件，開始侵華以來，直至太平洋戰爭結束（一九四五）之間，中日兩國人民來往中斷達十五年之久，而兩國的佛教徒之和平意願並未因此而消失，這就是在佛陀的偉大理想感召下所形成的。

現在我們更回顧香港與日本佛教的密切關係，作簡畧的敘述如後：

日本弘法大師自從西安青龍寺惠果阿闍梨得傳大法，歸國後大弘真言密教。一九二四年日本真言宗豐山派大正大學學長權田雷斧大僧正以中國密教式微，乃有反哺之意，於是應黎乙真張圓明兩居士之請，來港親授灌頂。翌年，黎張兩居士赴日本根來山接受金胎兩部大法，並授阿闍梨位。一九二六年黎乙真阿闍梨成立香港佛教真言宗居士林，舉行第一屆胎藏界灌頂大會，兩年後遷光明台九號。一九三〇年張圓明居士創真言宗居士林於光明台十一號，復於翌年舉行第二次胎藏界灌頂大會，參加者甚衆。現

在之主持者爲陳偉樞僧正及周塵覺僧正，秉承遺志，與真言宗豎山派取得聯絡，以同興密教爲職志。

日本真言宗豎山派總本部自一九六八年起，每年均派出「香港居士林參拜團」百餘人，於釋迦牟尼佛誕生日，在港舉行浴佛法要，並親善訪問。同時仿照唐代儀式作巡禮遊行，十分隆重。歷年擔任團長者有長岡慶信，小野塚潤澄，鳥居敬譽，川田聖見等管長大僧正，該兩居士林曾禮請大正大學教授勝又俊教博士來港弘法，主講：「即身成佛論」。並由黃繩曾居士演講「真言宗綱要」，葉文意居士講「弘法大師傳」，學人主講「日本真言宗源流」及「真言密教在印度及中國的發展」等公開講座多會，吸引不少聽眾對真言宗發生興趣。

第二屆世界佛教友誼大會於一九五二年九月在日本東京舉行，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會選派馮公夏、顏世亮、曾璧山，韋達四位代表參加。其時適在太平洋戰爭結束不久後六年，日本力求復興，所以對外國來賓極爲尊重，備極以禮款待，因此會議非常成功。大會後，全體被安排往參觀廣島原爆場，遺跡景象，觸目驚心，令人感到戰爭的殘酷可怖，致使全世界的佛教徒維護和平的意願此志不渝。

二年後，即一九五四年六月，日本女居士代表日本人民以頭髮織成一幅面積一方英尺之觀世音菩薩像，致送於香港人民，爲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佔領香港中所引起的死難人民，以表示懺悔之意，該觀音菩薩聖像爲金色線織成，手持蓮花，作跏趺坐，背後有圓光，襯在黑髮上，顯出莊嚴相狀，兩旁有「英靈供養，平和觀音」漢字。由日本曹洞宗管長高階瓏仙，日本佛教會董事長佐佐木泰翁，親自帶來香港，呈贈予香港佛教界代表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接納，現該聖像供奉於東蓮覺苑中，其中有中英文說明：

「髮曼荼羅——釋義

日本虔修信女謹捨其頂上青絲織成

聖觀自在菩薩象一尊敬奉，爲致念二次戰爭中，貴地罹難英靈，其時日本會使 貴地士民極受苦惱，今謹永表懺悔，

並祈願曰：

願此世界常安穩  
一切干戈永息滅  
信受如來真實言

是故我今頭面禮

日本曹洞宗管長 高階瓏仙  
日本佛教會董事長 佐佐木泰翁

甲午六月一

中國古語有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謹希望日本人民此後能遵守國際公法，不再侵略別國，與全世人民和平共處，有厚望焉！

一九五七年，東蓮覺苑與日本東京尼衆學校取得聯絡，兩方交換學生留學，七月東蓮覺苑派出佛學苑畢業生覺岸，慧明二法師往日本，八月日本近藤徹稱尼師來香港，在高等英文學校攻讀英文課程一年，已飛回日本。而慧明法師因水土不服，亦返回香港。東蓮覺苑再派賢德尼師赴日，故覺岸，賢德兩師在預修班修學一年後，已順利考入日本東京佛學大學，經過四年的修學，覺岸法師考獲學士學位後，返回香港任寶覺中學校長，而賢德師更求深造，在日本東京大學考獲佛學碩士銜，回港後不久，出任能仁書院哲學系教授，兩位尼師之勤修苦學精神，可為青年佛教徒立下模範，也是初次港日文化交流的成果。

一九七四年四月，是日本曹洞宗大本山總持寺開山祖瑩山禪師的六百五十年大遠忌，日本全國曹洞宗寺均派代表出席該寺嚴修大法宴，香港大嶼山寶蓮禪寺乃屬曹洞宗派，亦蒙總持寺貫首兼曹洞宗管長岩本勝俊之邀請赴日，特派出身慧法師、智慧法師、忍慧法師、紹根法師及施剛培、林一生兩居士前往參加，他們在日本逗留十天，與各方面佛教人士進行會談，成績美滿，然後回港。

該年十二月，日本曹洞宗由名譽團長岩本勝俊，團長成田芳觸，隨行長藏重徹應，岡部德雄，副團長久見貫一，三吉田暢，伊東豐饒，事務局長吉岡棟一，次長西村輝成，組成一百二十餘人之親善訪港團來港，以報聘寶蓮寺月前曾派代表團赴日訪問，並在該寺舉行一項法會儀式，以悼念戰時各國死難人士，及祈

願世界和平，先由客僧在大殿誦經祈願，後在祖堂禮祖，莊嚴肅穆，威儀隆重，表現兩地的佛教徒大團結。

學人因而根據各方面的禪宗資料，寫成二萬多字的「從中國傳去日本的曹洞宗」一文，登刊於一九七五年出版之「香港佛教雜誌第一七六至一七八期」，後來被選入張曼疇教授編之「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第十二屆世界佛教友誼大會於一九七八年十月，在日本東京及京都兩地召開，香港之三個屬會，都派選了代表參加：香港佛教聯合會為覺光法師，黃允畋居士，黃水居士，區碧茵居士，孫寶元校長，區潔名居士；香港僧伽會為洗塵法師，金山法師，暢懷法師，願炯法師，賢德法師，世佛會港澳分區總會為梁隱盦居士，忍慧法師，邵黃志儒居士，劉銳之居士，胡景賢居士，謝玉居士，張道運居士，釋性聰法師，王麗東居士及學人，共為二十一名，陣容鼎盛，而主辦者全日本佛教會，亦動用龐大人力和財力去辦理，並有多位日本知名佛教學者作「主旨演講」，成為該屆大會最特色的貢獻，故在宗教信仰和文化交流方面有傑出的成就，使參加者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大會之經過詳情，學人已寫成「出席第十二屆世佛大會記」一文，分期刊登於「香港佛教」及「南洋佛教」雜誌中，茲不再贅。

日前，日本佛教文化交流使節團專程到港訪問，特別為參加「港日佛教文化交流協會」的成立，顯出十分難能可貴。團長樞浦逸外乃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前管長，年紀已達八十高齡，為法奔馳，下機伊始，即駕臨妙法寺，並親自為香港協會各董事頒發選任證書，並致賀詞，親情懇切，令人十分敬仰。翌日，全體團員並到大嶼山昂平參拜寶蓮禪寺各大德，互作誠懇交談，在未來港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歷史上，揭開新的一頁。

縱覽上面所敘，香港和日本在佛教關係上，可說是十分密切。以前尚未有獨立的機構去統籌辦理雙方的合作事宜。現在，港日佛教文化交流協會已於日前成立了，我們不禁拍手稱慶，因為其成員人材濟濟，而且不乏港中碩學大德，集教育、文化、學術人材於一爐，定能有一番工作表現，可以預卜也。

## 捐 款 呸 謝

奚則閩居士	港幣	100.00元
李德遠居士	港幣	100.00元
鍾季蔚居士	港幣	200.00元
王壽都居士	港幣	200.00元
竺摩法師	港幣	160.00元
何重華居士	港幣	320.00元
妙法寺	港幣	6,607.40元
總計	港幣	7,687.40元

## 一〇三期收支報告

## 一、收入：

捐款項下撥入.....	港幣	7,687.40元
發行收入.....	港幣	385.00元
總計.....	港幣	8,072.40元

###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4,356.40元
稿 費	港幣	1,840.00元
郵 費	港幣	876.00元
什 費	港幣	1,000.00元
總 計	港幣	8,072.40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可是，學人認為在組織上仍不免有遺珠之虞！因為尚有其他有關日本文化團體之主管人，仍未有包括在內，故希望能夠擴大範圍，盡量吸收港日佛教文化界加入本會，共同襄理會務，群策群力，以底於成。

其次，本會應計劃設立香港佛教文化基金，為將來編印刊物，設置獎助學金，輔助旅行講學費用，作為發展文化主要用途。況且，本會應與日本文化機構，如大學，佛學研究院等取得聯絡，以交換學生或講師作好準備來提高兩地之佛教文化水準。際此本會初創成立時，百廢待舉，實在是一件艱巨的工作。但是，我們可以利用過去港日雙方所建好的基礎，努力擴展；加上海素以興辦佛教團體見稱之會長洗塵大法師，和副會長寶燈法師的能幹辦事領導下，定能克服困難，會務當能蒸蒸日上的，學人忝屬後輩，謹願追隨各位大德之後，竭盡棉力，為港日佛教文化事業作出效勞！

完稿於一九八零辛亥革命紀念日

卷

七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元」，S 三三九三作「先」。  
「酬償」，S 三三九三作「償酬」。  
「傾」，S 三三九三作「全」。  
「一」，S 三三九三作「可」。  
「極」，S 三三九三作「攝」。  
「扶論」，S 三三九三作「快輪」。  
「大」，S 三三九三作「有」。  
「碍」，S 三三九三作「卧」。  
「暗」，S 三三九三作「暗」。  
「朋」，S 三三九三作「明」。  
「邪婢」，S 三三九三作「耶嬢」。  
「之」，S 三三九三作「知」。  
「迷」，S 三三九三作「求」。  
「滄」，S 三三九三作「喰」。  
「地」，S 三三九三作「他」。  
「爭」，S 三三九三作「淨」。  
「酒肉俱不輕」，S 三三九三作「喫肉亦不輕」。  
「見病須慈遐」，S 三三九三作「見病慈須遐」。  
「日」，S 三三九三作「涅」。  
「持」，S 三三九三作「時」。  
「罷」，S 三三九三作「擺」。  
「憚」，S 三三九三作「微」。  
「富」，S 三三九三作「福」。  
「善」，S 三三九三作「微」。  
「紀」，S 三三九三作「記」。  
「停」，S 三三九三作「停」。  
「行」，S 三三九三作「孝」。  
「參」，S 三三九三作「僕」。  
「行」，S 三三九三作「參」。  
「知」，S 三三九三作「和」。  
「師僧來乞食，必莫惜家常，布施無邊」十四。  
「捨」，S 三三九三作「賴」。  
「弃」，S 三三九三作「去」。  
「S 三三九三作「智」。

布施無邊」十四字，S三三九三缺。

王梵志校錄附註